

大学管理学生的手为何越伸越长

■杜素娟

不许宿舍挂床帘、偷寄成绩单、建家长群、成立家委会……为何现在高校对大学生管理的手越伸越长？为何在明眼人看来违背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管理方式，高校却不惜冒着学生的一致反对，也要坚持实施？

这是高校和大学生之间在个人成长、自由、隐私这些重要命题中的认知错位造成的吗？

笔者不认为高校管理者不懂最基本的教育理念。而且，对学生的管理越多，高校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管理成本也越多。笔者相信这些“反常”行为并非出于校方本意，而是制度和文化双重夹击下的无奈之举。

大学管理的“底线思维”

高校之所以越来越爱管学生的直接原因，一是确保学生不出事，二是绝不能得罪家长。

学生的安全是学校管理的首要任务。如今，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学生只要在校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学校承担的都近似“无限责任”。

对管理者和教师而言，无论能力多强，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评职称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学校存在安全风险是客观事实。于是，为了尽可能降低事故率，学校会采取各种措施隔绝风险，为此甚至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小学要求课间十分钟不准下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高校不许学生宿舍挂床帘，其背后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学校之所以害怕承担风险，很重要的原因是官方在处理事故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对高校、学生和家长的三方责任划分可能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实践中，由于具体规定不细致，容易出现片面加大学校责任的情形。

很多高校都有过“校闹”的经历，这会严重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校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但因为缺乏有效的处置机制，校方往往只能妥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久而久之，高校成了惊弓之鸟。明知很多管理手段应对的只是极小概率风险，却还要做。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出事故，学校很难对家长作出“理性人”的预估。于是，高校管理手段只能按最坏结果设置，这是如今学校普遍的“底线思维”——最重要的是做好防备。

也出于以上原因，高校欢迎家长共同参与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建家长群、成立家委会就变得顺理成章，其隐藏的动机是责任共担。

为家长制文化留下“后门”

对于高校的很多管理方式，许多家长是欣然接受的，甚至有些做法是家长主动要求的。其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原因，让高校管理成为对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一种无奈“配合”。

家校共育应“适时引导”而非“过度干预”

■张静

近些年，我国一直在推动家校共育，也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作为一名“00后”大学生，家校共育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政策要求，更是一种适时引导。

记得初上大学时，我面临很多挑战。从高中的学习环境中突然“松绑”的我对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面对某些心理困扰时，我意识到很多问题与家庭环境有关。同时，一些同学因为家庭教育的问题，形成了不擅与人沟通的性格，并在猛然进入大学这个“小社会”时，遇到许多有关人际交往的问题。此时，家庭的适时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我逐渐发现，那种“考上大学就完成任务”的传统观念早已过时。大学是一个全新起点，也是我们真正开始独立思考、自主成长的地方。在此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困惑和挑战。此时，家庭的支持和学校的引导必不可少。

大学期间，父母经常关心我在学校的情况，甚至常常和我说：“现在大学生毕业都不管分配了，找工作也是难题。”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间接体现出许多“60后”“70后”父母还停留在高等教育培养的“老观念”中，需要接受新的高校教育理念，这是家校共育的必要性所在。

和同学聊天时，我也了解到他们对这一政策的顾虑。比如，学校的出校报备制度要求我们每次出京时，都要得到家长的知情同意。有同学认为这一规定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大学是一个让我们学会独立、自主思考的地方，过多的家庭干预可能会让我们在决策时犹豫不决，甚至产生依赖心理。

中国的孩子不管多大，家长都热衷管他们。无论一个人青少年时代多么渴望独立，一旦成为家长，就会不自觉地沿袭过去的家长制文化。

那么，什么是家长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府。要想维护几百人聚居的大家族，必须建立严整的家庭秩序，这就赋予给大家长，让他们拥有一切话语权。这样的家庭中，代际秩序森严，下一级对上一级只能服从。而随着大家族的瓦解，这种文化在小家庭的遗留会导致年青一代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和选择权，造成亲子关系的代际不平等。

这种家长制会演变出一系列不合理的道德逻辑，比如年轻人“不听话”就等同于“不孝顺”，要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家长制文化的延伸会造成很多父母没有学会“课题分离”（即分开事情或者问题的责任归属），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大包大揽、过度保护。

这种做法会弱化孩子独自应对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年轻人的成长是要经历失败、挫折的，孩子越早独立，长大了就越安全，反之，则只会培养“巨婴”。而孩子越表现得像巨婴，父母就越认为他们需要管理和保护，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学生进入大学就“躺平”，因为突然没人管了，而整天不学习、游戏人生、大量挂科，让父母更加坚信孩子不管不行。于是，学校、家长轮番上阵。这些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建立起自我，他们距离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太远了。

大学生独立的最基本体现就是能独立管理自己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但由于家长的过度保护和干预，学生失去了养成这些能力的机会。

“课题分离”的典型症状之二便是把孩子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这一点更为致命。没有完成自我独立的家长会把自己和孩子过度绑定，尤其是一些母亲在有了孩子后，逐渐丧失了对自我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照顾孩子。有人将其视为美德，但其实后患无穷。

我们曾发现过一些极端案例。比如一位母亲从孩子读本科、硕士再到博士，一路“陪读”。早已成年的孩子非常孤独、厌倦且痛苦，但又无力摆脱母亲的依附，最终得了精神疾病。

很多家长不会“陪读”，但他们的“雷达系统”会紧紧跟着孩子，要求高校建家长群、家委会的本质就在于此。有的家长天天和孩子视频，时刻掌握他们的动向。这些家长的“想象力”总是格外丰富，在他们认为孩子“失联”的时间里，会想象出无数种可能的意外。分不清爱与控制的边界，对孩子和家长而言都是一种伤害，结果换来的是不断的冲突、越来越深的隔阂，甚至是孩子对父母的怨恨。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死穴”。

如今，由于“责任共担”的内在需求，有的高校不仅没有与滞后的家庭教育理念拉开距离，反而在客观上为部分家长控制孩子“开后门”。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总之，想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的难题，既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帮助高校提高抗风险能力，纠正社会对于高校“无限责任”主体的错误认知，也需要广大家长群体摒弃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中的某些滞后观念，建立起更健康的亲情关系。就这一点而言，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希望更多学生、家长参与这样的讨论和反思，这是行动的开始。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本报记者胡珺琦采访整理）

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 家校共育

编者按

向学院请假回家奔丧的5天假期被老师“砍”成3天，不许在宿舍挂床帘、给家长寄成绩单、建家长群、成立家委会……今年以来，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新闻频频冲上热搜。其背后是高校面对“无限责任”时的无奈自保，大学生一边被指责“巨婴化”、一边却没有被作为成年人尊重的矛盾现实，以及一些家长对高校的不合理要求和对孩子成长的过度干预。

为什么高校、大学生、家长的权利和责任边界一再被突破？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现实中又应如何理性化落地？大学里的“家校共育”现象是审视这些问题的一个窗口。为此，《中国科学报》特邀一些既是家长，也是教育专家的家长，也是教育专家的高校教师，以及学生代表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将对大学管理边界的研讨引向深入。

所谓自我认同，指青少年向成人发展过程中形成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清晰思考结果。如果青年能整合自我认识与外界对其的角色期待，想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愿意用行动实现，意味着他完成了自我认同，否则可能使自己处于角色混乱的困境，在众说纷纭中迷失自我。

该过程发生在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形成了自我认同。此阶段的大学生，最需要的是获得探索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空间与自由，自主作出人生选择。当他要为选择承担后果时，才能真正学会作出对人生负责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他的独立自主意识、决策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才能充分发展。

因此，自主授权是父母赠予子女的成人礼。这意味着父母要给予子女为人生负责的决策权，也要信任子女通过学习，定能独立自主，鼓励他们信赖自身能力，勇敢作出决定。

蒋志海制版

如今，大学生因原生家庭原因而“带病入学”，最终导致心理危机频发，或因家庭教育诱导诱发严重违纪、违规，以及因思想偏激导致难以适应大学生活等案例与日俱增。笔者长期在一线从事学生工作，看到不少因家长用锅导致学生问题加重的现象，也见证了因权责边界模糊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愈加“中学化”，更观察到管理者因能力缺乏难以驾驭，致使家校联动不欢而散的情况发生。

显然，家校协同育人的问题日益迫切。但不久前，国内多所高校向家长寄成绩单的事件却引发舆论持续发酵。很多人对寄成绩单、组建家长群等类似于中小学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大学生已成年，需要对自身行为负责，抑或直接中西对比，质疑大学人才培养理念落后，甚至怀疑高校当“甩手掌柜”，逃避人才培养的主责主业。

然而，大学阶段是学生从家庭照护生活向适应集体生活的调整转换期，也是应试教育向专业教育的转型过渡期，更是“三观”形塑的拔节孕穗期。显然，现在要讨论的不应该是家校要不要共育，而是在共育问题上，家校双方的边界在哪里。

首先要明确，人才培养是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在大学阶段，学生除了专业、学业外，思想与生活、情感与人、择业与就业等问题交织相伴。因而，大学生培养必须要整合学校、家庭乃至社会的育人资源并形成合力。要更好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的专业教育和集体生活，就必须在充分了解学生、生貌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学校与家庭缺一不可。

因此，争论要不要家校联动、互通生情毫无必要，真正需要探究的是家校联动到什么程度、如何尊重和保障大学生的个人隐私。比如，学生出现严重的身心障碍时，就需要家校双方全面、准确地互通病情；学生出现严重的违纪、违规情况，甚至危及学业、毕业安全时，家长也有权且必须知情；学生无法适应大学生活，出现严重的学业困难且无法自我调节时，更应主动告知家长作进一步处置……

同时，高校不能像对待中小学生一样处理大学生问题，忽视学生内心诉求和心理感受，直接把问题甩锅家长，事事都向家长通报、事事要家长反

馈的做法，不但没有揽起高校人才培养应尽的责任，也没有正视学生成长、成才规律。

如今，高校学生管理“中学化”的倾向日益突出，由上而下严格要求的闭环管理、处处留痕，既让学生在一线工作的教职员工身心俱疲，也无益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健全人格。究其实质，乃是为了应对压力层层传导与规避责任事故所采取的无奈举措。这也突破了当前高校依法治校的尴尬境遇——校方往往是学生事故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与其说是弥补管理漏洞，毋宁说是校方谋求自保。

在高校中，一线辅导员是连接家校的桥梁纽带。笔者长期在学生工作一线，在实践中深感面对多种问题交织的学生群体，如果没有家校合力，单方面依靠家庭或甩手学校都是对学生的极不负责，至于希望学生自己承担责任也不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直面学生与家长的辅导员是家校共育的关键主体，如何提升他们的责任心、爱心与能力，支持他们更好开展家校共育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共同的诉求与目标，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是家校双方理想的关系状态。因而，要真正做到在充分尊重、保障学生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让轻度问题在校内解决、中度问题视情解决、重度问题家校共同解决，这才是理想的家校协同育人格局。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师，本文为安徽省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sztsjh-2022-8-10））

家校共育问题的核心在「边界」

■马星宇

自主与幸福 应成为家校协作的共同追求

■詹逸思

“亲友们，大家好！”这是2017年清华大学首次召开新生亲友交流会时，所有发言人对新生家长说的第一句话。

与在幼儿园、中小学参加的活动不同，父母整场都被称呼“亲友”而非“家长”。这背后隐含了大学教育者对高等教育中家校合作定位的思考。

大学阶段要不要家校合作

自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父母对未成年人有家庭教育责任已成社会共识。但面对大学生，家长该扮演何种角色却颇有争论。一派认为，子女已离开家庭进入大学，父母不应再参与大学教育，家校合作共同育人更无从谈起；另一派则认为，子女虽已到法定成年人年龄，但其人格成熟度还未充分发展，社会经验不够，即使进入大学，父母仍要参与子女教育，与大学形成家校合作育人合力。

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教育中扮演何种角色？这需要根据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阶段分类讨论。当前，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群体越发多样，其发展也呈现多元化特点。从文化多样性看，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家庭教育观有诸多差异。比如，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其中许多在经济上已独立，父母参与较少。但韩国、马来西亚等东亚文化国家，家庭与子女的关系更为亲密。

笔者每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总会有美国大学同行与笔者讨论如何理解中国学生的“家庭教育”。对此，笔者从大学教师视角，谈谈在大学中家校协作的共同追求——自主与幸福。

成为“独当一面”的成年人

曾经有一位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向我倾诉他与父母交流的困惑。

当时，正值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时机，该学生和父母表达了想从自动化专业转到其他专业的想法，但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自动化专业是热门“好”专业。该生试图与父母交流想法，但是后者生怕孩子走上“不正确”的道路，甚至坐飞机到北京，试图当面说服孩子。

事实上，这名学生并没有决定要转出自动化专业，只是在考虑也许有什么专业更适配自己对生命的兴趣。父母的强烈反应让他不得不暂停探索个人志趣如何与社会需求形成内在整合，转而安抚父母情绪，为自己争取选择专业的决策权。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该同学正在经历每个大学生都必经的自我认同成长。

所谓自我认同，指青少年向成人发展过程中形成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清晰思考结果。如果青年能整合自我认识与外界对其的角色期待，想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愿意用行动实现，意味着他完成了自我认同，否则可能使自己处于角色混乱的困境，在众说纷纭中迷失自我。

该过程发生在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形成了自我认同。此阶段的大学生，最需要的是获得探索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空间与自由，自主作出人生选择。当他要为选择承担后果时，才能真正学会作出对人生负责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他的独立自主意识、决策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才能充分发展。

因此，自主授权是父母赠予子女的成人礼。这意味着父母要给予子女为人生负责的决策权，也要信任子女通过学习，定能独立自主，鼓励他们信赖自身能力，勇敢作出决定。

有的父母可能会担心，类似专业选择这种影响人生走向的重大决定，如果因为子女缺乏经验而失误了怎么办？

这的确是需要直面的问题。父母在孩子缺乏经验时，可以辅助支持其决定，但切忌替代他们决定。例如，可以倾听儿女选择专业时考虑利弊对比，指出不应忽略的视角；为他们提供多年专业的精准信息介绍……众多心理学家通过多年实验研究发现，善于自主授权的父母养育的青少年会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学习的自主性更强。

总之，家长即便知识和社会经验丰富，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支持大学生自主决定，使其成为“独当一面”的成年人。

托底关爱：遇见更健康更幸福的青年

新冠疫情时，曾有位家长在新学期开学后找到我，咨询如何安慰女儿。原来，大一结束后第一个寒假，她的女儿回家后表现出了经常性控制不住的担忧——担心成绩难以保持优秀、舍友不喜欢自己……但她的成绩在班里并不差，与舍友也仅发生过常见的一两次拌嘴而已。听完家长的讲述，笔者建议她陪孩子去医院精神科检查，她很配合。经医院检查，该生被确诊为由于大学新环境应激性引起的焦虑，并建议服药。

此后，这位家长向单位请假，跟随女儿的学习节奏，陪伴照顾她服药、复查，直到结果好转。后来，她利用节假日，一有空就陪伴女儿复查拿药，并与班主任、辅导员积极沟通情况，和女儿一起想办法适应疫情时变化的节奏。一个学期后，她女儿终于康复并适应了大学的集体生活。

面对生病的女儿，这位家长的做法堪称家校合作的典范。但高校在实际育人中，也时常遇到不愿意合作的家长。

例如，笔者就曾遇到过儿女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需要休学回家休养、接受专业治疗时，其父母否认孩子生病的事实，并指责学校导致孩子状况不良的情况。有的父母认为孩子还要坚持学业，不支持休学，有的父母甚至无法联系上……这些需要24小时关心、照顾的学生难以得到家人的支持，使得家校合作难以进行。即使高校安排合作医院的绿色通道、心理咨询中心的专业咨询师咨询资源，也难以匹配至学生。

除心理健康不佳外，当子女在生理、人际、学业、求职等方面遇到困难时，同样需要亲友的关照。此时，如果父母能敏锐察觉，与子女一起想办法，对其走出困境无疑是雪中送炭。

假如父母也曾处于类似的困境，那很幸运，其自身的经历就能治愈子女。假如遇到的是新时期的新问题，父母也可以作为最亲密的亲人、朋友、主动和儿女一起请求大学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协助，主动使用校方的经济资助、学业指导、就业指导、医疗等资源，这样一定可以更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托底关爱的家校合作可以让学生会体会到如何爱自己与他人，如何在困境中坚忍不拔、积极乐观，如何调节情绪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努力跨越挑战的青春、经历生活的挫败，是赠与儿女的另一份成人礼——奋斗后的幸福感。

就像清华大学的大学新生亲友交流会上一样，父母从关爱教导成长的“家长”，转变为关爱同行相伴的“亲友”，不变的是对孩子无条件积极的关心关爱，变化的是自主授权，往后退一步，欣赏见证他们精彩的成人之旅。

（作者系清华大学大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